

“十八大”再燃改革热情 经济增长长期盼制度红利

□ 潘圆

十八大报告中 86 次提到“改革”，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 次提到“深化改革”，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改革的热情。曾被认为是创造中国式奇迹的“钥匙”的改革，今天在引领 13 亿人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中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以及更殷切的期望。

“未来 10 至 20 年中国最大的投资是改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有巨大的制度红利。中国民众对于中国政府寄予无限的期待。”在刚刚闭幕的“2012 财新”峰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深有感触地说,“民众期待巨大的制度红利,顺应民意,进行制度改革将焕发经济的活力。焕发经济活力不应靠政府管制经济,而是靠市场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更是用“十八大后的期许”作为自己演讲的题目。他认为,十八大召开前,国内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讨论当中,相当多的人对十八大寄予希望:重启改革议程,改革再出发。“现在十八大闭幕了,就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期盼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也就是说,重启改革议程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关键在落实。”

吴晓灵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主要面临三个问题。其一,经济结构调整和寻求发展的动力。其二,政府的财力和民众诉求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政府在有限财力下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其向民众承诺的福利待

遇之间的矛盾,正使欧盟和美国面临难题。其三,全球化以后贸易保护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贸易往来,才能使大家走出困境,但金融危机又使得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这对于未来全球协同发展会有一些的影响。”

吴晓灵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共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在于各国政府完成自己的制度变革。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前进要靠制度变革,中国前进的动力也在于制度创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说,中国在过去 35 年中,差不多每十年会有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改革。

第一次是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标志着改革从农村全面进入城市,改革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二次是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对上世纪 90 年代改革作了个注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框架,城市改革由此全面推开;第三次是 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若干问题的决议,改革由此步入深水区、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思想界怀疑、否定改革的声音也再次出现。

“每次改革出现徘徊就酝酿下一阶段改革的高潮。按此规律。2013 年又是一个十年的开始,期待形成下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下一次改革,现在献计献策很有意义。”

“未来 10 至 20 年,中国最大的投资是改革。”经济学家周其仁试图从投资、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改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外需增长乏力,内需的增长主要与投资、消费相关。而投资与消费这两驾马车之间的关系至关重

要。现在消费受到收入等因素的制约,增长缓慢。于是更多人把希望寄托到投资身上。但投资最终要靠消费埋单。“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投资能不能有收益?”

他认为,投资和消费有矛盾,但不对立。关键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是不是适合。如果比例失调,国民经济难以健康发展。投资消费之间要积极互动,这就需要一套好的经济制度。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无法奠定长期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

他认为,由于现有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无法判断。未来改革方向,应该努力使价格消费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推进相关方面体制改革。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应适当增加消费所占比重,“消费增长远不是给一鞭子、拨一下开关就往前走那么简单。”消费比重的增长,首先有赖于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这又涉及到国家很多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涉及到市场经济基本秩序的进一步确定。

“两个毫不动摇”意味漫长

李剑阁说,“不管怎么改革,都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 20 周年。20 年前明确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经济学家把中国在危机中遭受损失较小,归结为政府干预。此后政府干预有强化的趋势。重温市场经济对下一步改革有好处。”首先要打破垄断,放开准入。现在很多重要领域,不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虽然新老三十六条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垄断领域,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次,要放开管制,减

少干预,强化竞争。

吴敬琏更关注十八大报告里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他说,这是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命题,在过去的讨论中,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意见。有的强调这一面,有的强调那一面。十七大的报告,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后面加了一句话——“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但争论并没有平息下来,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十八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中,有一个很突出的争论,就是国有经济是不是比私有经济效率更高?“这次代表大会对两个毫不动摇基本上是按照十六大、十七大文件写的,但是后面的说明更加具体。”

他分析,十八大报告中,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后面加上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句话。这也提出了一个方向,通过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从某一方面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步改革按照什么方向设计?吴敬琏强调,应该按照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指出的方向,作出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然后就是执行问题。“过去 30 年,改革其实都是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的过程中前进的。那么执政党必须向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坚决地克服特殊利益社会群体的阻挠,使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这样,十八大作出的决定,才能落到实处,建立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中国。”

吴晓灵指出,未来中国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着力点主要在四个方面。其一,顺应民众反腐倡廉和政治改革的诉求,把保障公民权利和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落到实处,要从诚信正义着手,落实公民对各层次、各领域事务的参与权,包括立法权、预算审查权、环境保护和重大项目的审查权利。其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重点是约束公权力,落实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无序扩张的问题。其三,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利,合理界定国有经济的边界,探讨多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现在全中国人民都是有财产的,农民有承包的土地,城市居民有自己的房产,公平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财产权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向每一个公民做到的一个承诺。公民的财产权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社会资本,就是公有制的多种实现方式之一。其四,要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解决二元社会的矛盾。重在让农民享受土地的增值收益,落实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首任部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工业的发展。他注意到,十八大提出 2020 年小康目标更完整系统,其中要求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他说,“这非常振奋人心。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加速期,压力很大,责任很大。工业化要有量化标准。现在世界通用的工业化标准是人均 GDP 达 1 万美元。目前中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他强调,改革将推进工业化的实现,“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绝非易事,但是我们有信心。”

中国经济改革和再平衡的实现路径

□ 刘卫平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正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迅速向保护主义这一对自由贸易政策有着巨大冲击的方向转变。为此,应将综合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再平衡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内外挑战的战略选择。

面临的挑战: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三是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三大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不均衡、能源和环境瓶颈,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三项重大发展挑战。如果没有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进行的大量净资金转移,将造成金融资源分配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内部及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等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独特背景。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按照十八大的规划,还有大量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融资建设;另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使长期处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产产品向低能耗、高附加值水平转变。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 50%,距发达国家 8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正是这个差距和压力决定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更决定了未来几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建设和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需求,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

就国际化而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我国也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国际合作,从中熟悉国际规则并寻求与掌控其发展空

间。一方面,我们需要为国家的发展到国际市场“开发”资源;另一方面,在促进全球 GDP 增长的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建立从基于“开发”理念到“发展”理念的模式转型,并向投资对象国输出整套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

快速采取行动: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应该及早做出战略规划,借鉴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转型。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吸引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为此,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发展理念,应该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从“科学”到“思想”发展的战略转变,并以此制订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参与全球治理发展需求的战略和方法。

中国再平衡总体战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今中国与全球经济已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

衡。

首先,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内外兼顾、积极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失衡的主要顺差方,又是当前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时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然而,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主要由我方造成,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

其次,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盯住其他意义更为深远的目标。其一,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以往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以往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其二,通过积极参与 G20 等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三,通过创造消费需求,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再次,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要点是:第一,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实现储蓄与投资的相对平衡;第二,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实现商品出口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第三,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 G20 等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第四,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再平衡的内外路径: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

在内部路径方面:第一,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受制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预防性动机和传统消费观念,中国私人消费仍然增长乏力。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实现收入均

等化是刺激消费也是稳定社会的首要路径。现有的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推动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但忽视了机会均等化对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基础上,更要强化在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均等化,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予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负,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使私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他国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最终加工装配制成品的“转嫁性”出口,这体现了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应更加重视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升级,从而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仍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才能营造创新这一商业活动所必须的土壤,这比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更为重要。

第三,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金融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市场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将经常项目盈余留在国内使用,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之一。

在外部路径方面:第一,推动 G20 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G20 比 G8 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当前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更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势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拥有较之以往更大的话语权。中国需联合“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动 G20 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国内、国际政策协调,扭转失衡的循环机制,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二,加强与美日欧的双边、多边经济协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协调,中美是此次失衡最重要的顺差方和逆差方,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中国是

美国政府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两国经济如果能够真正实现结构上的再平衡,则全球经济再平衡水到渠成。但这需要中美两个大国在追求国内经济目标的同时,协调双方的国内、国际政策。

第三,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国商品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因此受欧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必须重视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同时,也应不断扩大进口市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消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所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决定了失衡循环机制的方向性——盈余以美元资产回流美国支撑其高消费,同时也成为美国低成本向外转嫁危机的基础。因此,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多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须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协办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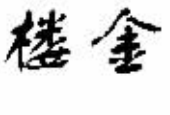


海南亚洲

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经理:



地址:

海口市国际商业大厦12层

电话: 0898-66775933

传真: 0898-66700763